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芦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二十余公里的宛平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东西两岸。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就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开始了它们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一、事变前的双方态势

日本侵略军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在其灭亡中国基本国策的驱使下，立即以东北为基地，向中国内地扩张，迅速将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日军先是占据山海关，接着又侵占我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当时称热河省，1956 年撤销），在占领了承德之后，又向长城一线发起进攻。至 5 月 13 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华北危急关头，5 月 31 日，国民党亲日派官员熊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香河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划上述连线至长城为非军事区，非军事区内由日军驻屯军管辖。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非军事区”，仅仅是为了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而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日本侵略军顺利占领而找的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

《塘沽协定》的签订，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北平（今北京）、天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对日本来说，《塘沽协定》“合法”地把热河并入了伪满洲领土，这不仅巩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也打开了其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自此以后，日本即利用《塘沽协定》，以重兵压迫关内，威胁平津，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日本方面：日本是个只有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很少，当时人口只有约 7000 万，连同受其控制与奴役的朝鲜与台湾在内，人口也不足 1 亿。但是，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都较高，1936 年的钢产量即达 640 万吨，能制造航空母舰、战列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年生产能力：飞机 600 架，坦克 200 辆，在作战中基本可以保障需要。日本有常备军 38 万余人，陆军 17 个师团、海军舰艇约 190 万吨，空军 54 个中队，飞机 2700 余架，其中属于陆军 1480 余架，属于海军 1220 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编制为：每个师团约 22000 人，马 5800 匹，步骑枪 9500 支，轻重机枪 600 余挺，火炮 108 门，坦克 24 辆。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主力驻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各地，处于临战状态，可以通过受其控制的北宁铁路（北平至沈阳）迅速运抵中国华北。

为了做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1936 年 4 月 17 日，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18 日发布陆甲第 6 号军令，对中国驻屯军进行改编，规格与关东军相同，司令官由陆军中将或大将担任，新编制如下：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步兵第 1 联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 2 联队
中国驻屯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骑兵队
中国驻屯战车队
中国驻屯工兵队
中国驻屯宪兵队

中国驻屯通信队
中国驻屯军医院
中国驻屯军仓库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大将。司令部、中国驻屯步兵第 2 联队、军直辖各部队驻扎天津；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旅团长何边正三少将）、中国驻屯步兵第 1 联队驻扎北平；其他部队分驻于各驻屯点。随着中国驻屯军的升格，5 月 6 日，日本内阁又发布了临参命第 51 号，规定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关东军将一部分兵力配置在长城线南侧，随时准备出兵华北。6 月 3 日，又制定了 1937 年度对华《用兵纲要》，准备以 8 个师团在华北五省作战；以 5 个师团在沪宁方面作战；以 1 个师团在广州方面作战。

根据调整后的中国驻屯军新编制，1936 年 5 月，日本便急剧增加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 5 月 9 日至 6 月上旬，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中国驻屯军由 2000 人增加到 6000 余人。日本这次增兵华北，既是其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又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

外国在华北驻兵始于 1901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作战后，取得在中国北京、天津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的驻兵权，1901 年 11 月 24 日，日本派出“ 清国驻屯军 ”，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 年 10 月改称“ 中国驻屯军 ”。日本“ 华北驻屯军 ”长期侵占上述各地。至 1935 年 5 月，其已有北平驻屯步兵 2 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 8 个中队、山炮兵 1 个中队和工兵 1 个中队。这些日本兵分布在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上海驻屯军略）。

当时，《辛丑条约》规定：“ 中国国家应允，由各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 ”条约说得很清楚，各国驻兵范围是从北平到海口，即从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驻兵的目的也是确保北平至海口的交通畅通。而今日本人增兵华北，既未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又未与各国协商。而且增兵的目的，据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元帅解释说，一是为了“ 防共 ”，二是为了“ 保护侨民 ”。这与《辛丑条约》中关于各国驻兵的规定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所谓“ 防共 ”和“ 保护侨民 ”，都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全面侵华战争准备而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的基本国策。早在 1927 年 6 月至 7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上，讨论并决定对华方针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 7 月 25 日在给天皇的奏折中便提出：“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多年来，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在为侵略中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战争准备。1936 年“ 2 · 26 ”事件后组成的广田法西斯内阁，其灭亡中国的步伐愈发加快。1936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首、外、陆、海和藏五相会议所确定的“ 国策基准 ”，主旨就是加紧扩军备战，尽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根据“ 国策基准 ”，1936 年 11 月 26 日，日本陆军本部制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计划以 1937 年为第 1 年度，到 1943 年将已有陆军 17 个师团扩充为 41 个师团，空军 54 个中队扩充为 142 个中队；海军要建造包括巨型战列舰“ 武藏号 ”“ 大和号 ”在内的、总吨位达 27 万吨的 66 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扩军目标，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首先就要解

决战争经济的资源供给。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便把攫取资源的贪婪目光盯住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华北。1937 年 1 月广田内阁辞职，林铣十郎出来组阁，5 月林铣内阁辞职，近卫继任。在近卫内阁中，入阁大臣有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大将、海相米内政光大将、藏相贺屋兴宜。内阁的核心人物——首、外、陆、海藏五相，都是清一色的法西斯分子。1936 年以来，日本政局的这种动荡，正是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要求已是急不可待。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车轮，终于由近卫内阁启动了。

中国方面：中国领土广大，超过日本数十倍，资源丰富，战前人口约 4.5 亿，超过日本 6 倍多。国民党在十年内战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陆军系统，当时国民党政府有陆军步骑兵 191 个师、52 个旅，海军船艇 5.9 万余吨，空军飞机 300 余架，总兵力约 200 万人。中国经济落后，战前年产钢不足千吨，军火工生产能力也是微乎其微，只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难以满足战争需要。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大炮、坦克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向国外购买，战争过程中难以得到及时补充。

1933 年起，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国民党着手国防整备五年计划，首先对陆军进行编制和装备方面的整顿，从而使中央嫡系部队的现代化程度大大加强。其主力和精锐步兵师的编制：师司令部、2 个步兵旅、1 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及特务连、卫生连、通讯队等，人员约 13000 人、马 3500 匹、步枪 6200 支，轻重机枪 320 挺、迫击炮 24 门、步兵炮 24 门、野炮 36 门。步兵师的这种装备是当时的世界水平。国民党军拥有 50 个这样的师，计 69 万余人。而中央旁系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则大大逊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三是内部不同派别、特别是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在这三大矛盾中，国民党政府理应把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放在首位，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到 1936 年西安事变前，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无情镇压的反动政策。特别是在外寇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政府还设想利用日军的进攻来削弱其他派别的力量。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政府一再屈膝退让，给日本法西斯向华北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不但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而且随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还将日本侵略势力引进了冀东、察东和绥东，造成了华北局势的严重危机。

面对日寇嚣张的侵华气烟，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抗日的军事准备，但其准备的重点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和美英势力的中心——上海、南京和武汉方面，而在北平、天津及河北地区，却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因此，战争前线的国防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

“七七事变”前，位于国防第一线的部队，是国民党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非国民党中央嫡系。第 29 军下辖 4 个步兵师（每师 4 个旅），1 个骑兵师，3 个步、骑独立旅及 1 个保安队，共约 10 万余人。军部在北平。该军分驻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平绥和北宁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具体兵力部署：第 37 师（师长冯治安）辖第 109、第 110、第 111、独立第 25 旅，约 15000 人，驻西苑；骑兵第 9 师（师长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章）约 3000 人，特务旅（旅长孙玉田），约 4000 人，同驻南苑；独立第 39 旅（旅长阮玄武），约 3000 人，驻北苑；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约 2000 人，驻黄寺。以上各部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对峙于北平近郊；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辖第 112、第 113、第 114、独立第 26 旅，约 15000 人，驻天津及北宁路北平至天津段沿线，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2 联队对峙于天津地区；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辖第 1、第 2、独立第 27 旅，约 15000 人，作为二线部队驻河间县；第 143 师（师长刘汝明），辖第 1、第 2、独立旅 20、29 旅，约 16000 人，以及独立第 40 旅（旅长由刘汝明兼），约 3400 人，驻张家口地区；独立骑兵第 13 旅（旅长姚景川），约 1500 人，驻宣化。以上各部于日本关东军对峙于张北、沽源一线。

国民党的上述兵力部署，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作为战争前线，在日寇虎视眈眈下处于最危急境地的平津地区，恰恰是国民党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尽管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前线却只有第 29 军，而且黄河以北的冀鲁地区没有配置任何预备兵力。在强寇临境的危急时刻，华北地区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门户大开。因此，“ 七七事变 ” 发生后的严重局面也就无可避免了。

二、策动“华北自治”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北平、天津），面积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人口7620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华北地区物产丰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就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

1935年11月12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陈兵山海关。接着在日本武力保护和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制造了“冀东事件”，将通县以东22县划归己有，在侵占我东三省及热河之后，又掠走了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之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北平、天津实际上已完全陷入日本人的包围之中。这样，到1935年底，日军侵略军已完全掌握了进出华北的陆（北宁铁路）、海（塘沽军港）交通，并可以此作为进攻河北、山东的跳板。迄1937年初，日本侵略军全面进攻华北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兵力部署亦已就绪，其关东军作为二线部队，占领长城各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一线以南地区，作为战略机动部队；日本中国驻屯军作为一线兵力，屯兵平津，跃跃欲试。这两支侵略军构成了互相策应的犄角之势。日本帝国主义在取得了对华北的上述有利态势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华北伸出了魔掌。

1933年2月13日，关东军在进行热河作战时，就把驻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火速派到华北，建立天津特务机关，借关东军在热河对华北的压力，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5月21日，板垣在给陆军本部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就巩固与确立满洲国而言，在华北建立亲日满政权最为必要。”1934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召集日本驻华各地武官，多次进行密谈，曾设想联合华北和西南各地军阀，南北夹击国民党政府，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以分而治之。1935年1月初，关东军在大连召开日本驻华各地武官会议，进一步商讨侵略华北的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华北进行新的侵略的动员令。会议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为了减少在夺占华北时军事上的压力，日本人还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逼迫中国减少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1935年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东北义勇军进入了河北省以东非武装区地带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口头通告：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的第51军及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省；把平津地区划入非武装区地带；取消一切排日机关等要求。第二天，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一个中队竟然乘坐装甲车，在河北省政府前举行武装示威。此外，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所提的条件，6月7日，关东军还调兵遣将，将军队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唐山一带，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酒井隆甚至还限定中国方面必须在6月12日前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断然之处置”。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完全屈服。6月10日18时，何应钦通过日本驻北平助理武官高桥，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答复说：“根据中央训令，全部接受日方要求：（一）关于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的撤退，十日发出命令，自即日开始；（二）第51军调防自11日开始，利用铁路运输，预定于6月25日调防完毕；（三）决定将中央军第25师及第2师从河北省撤出；（四）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外排日。”这就是臭名昭著

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何梅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继《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丧权辱国协定。

在此前后，关东军也加紧向察哈尔（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分）渗透。1935 年 6 月 5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 4 名特务，在从多伦到张家口的途中，因拒绝接受中国军队的检查，在张北被宋哲元第 29 军第 132 师逮捕，经过审讯，于次日上午释放。11 日下午，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即借口日本特务在审讯中受到恐吓，向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一）惩办直接负责人；（二）第 29 军军长亲自向日本人道歉；（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限 5 天内答复。还没有等到答复，日本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即想利用宋哲元与蒋介石的矛盾，希望以宋哲元的 29 军代替于学忠的 51 军，以此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6 月 23 日，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向秦德纯提出了关东军制订的《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求：（一）宋军撤至长城西南；（二）解散一切排日机构；（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25 日，土肥原又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 3 天内不答复，他就回长春了。这就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动。6 月 27 日，秦德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终于接受了土肥原提出的全部要求，双方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如出一辙，它同样是日本蓄谋吞并华北的产物，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不久，于学忠的 51 军外调，宋哲元的 29 军根据协定移驻平津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因而，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达到吞并华北的目标。

日本对华北的扩张，先是采取以军事为后盾的蚕食手段，扶植亲日傀儡政权，实现所谓的“华北自治”，妄图把华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不战而获。

1935 年 9 月 24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俊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以及“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等等。多田声明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要求，这表明日本已是迫不及待地要控制整个华北。当时，中国的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田声明说明“日人在最近必完成其囊括华北，侵略西北之野心。”和“多田声明”相配合，10 月 4 日，日本又进一步提出了当时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一）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政策，采取对日亲善政策；（二）不但要使中国事实上默认满洲国，而且至少使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合作与交往；（三）使中国协力排除赤化势力。由此可见，“广田三原则”不仅要求华北建立亲日政权，而且还妄想把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变成亲日政权，以便控制整个中国。

10 月中旬，关东军将土肥原派到天津，加紧实施华北“自治”的活动。土肥原一到华北，就四处活动。开始土肥原曾计划联合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后来又提出以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为中心，先实现河北、察哈尔两省“自治”然后再联合阎锡山等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为配合土肥原计划的实施，11 月 12 日，

关东军命令第一混成旅团进至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待命，16 日，又令空军的两个中队随时准备向华北发起攻击，海军也在青岛集结，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宋哲元就范。18 日，土肥原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宋哲元不在 11 月 20 日前宣布“ 自治 ”，日本将单方面自行宣布。这时，日本政府考虑到土肥原急于求成的作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担心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而且自己准备还不完全成熟，因而没有同意土肥原限期宣布华北“ 自治 ”。土肥原只好于 11 月 24 日，在通州成立了以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12 月 25 日，改称“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是日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为日后在华北扩大侵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成立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其实现华北“ 自治 ”的计划，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11 月 29 日，宋电告南京政府，认为“ 挽救华北只能实行自治，别无出路 ”。这表明宋哲元此时已感到难以承受日本人的压力。11 月 30 日，蒋介石与其军政要员商讨后，派何应钦等人到北平与日本人商讨解决华北问题。何到北平后，经与各方面的协商，在得到日本的允诺后，决定成立“ 冀东政务委员会 ”。12 月 18 日，“ 冀东政务委员会 ”正式成立，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秦德纯等 17 人为委员，负责管辖平津地区和河北、察哈尔两省。同日，宋哲元发表施政纲领，宣布：（一）进行地方改革；（二）整顿财政；（三）“ 冀东政务委员会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益计，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 ”由此可见，“ 冀东政务委员会 ”是一个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的半自治政权，可以说，它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所产生的“ 怪物 ”。该政权的成立，又给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日本在策动华北“ 自治 ”的同时，还配合以经济侵略方式，以达到全面控制华北之目的。1936 年 1 月 13 日，日本陆军本部在《处理华北纲要》中提出，通过对冀东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 自治 ”。8 月 11 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指出：“ 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地。 ”同日，在内阁《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进一步指出：以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在同一文件的两个附件中，还要求“ 冀东政务委员会 ”在关税、金融、交通等方面实行独立，并把铁、煤、盐、棉花、燃料、羊毛等作为日本国防资源进行开发。可以说，这是一个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同年 9 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宋成立日本人所设想的“ 华北国 ”，在遭到宋哲元拒绝后，又向宋哲元提出“ 中日经济提携 ”的具体侵略计划。日本人之所以在华北如此得寸进尺地制造事端，不仅仅是为了掠夺华北资源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12 月 4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告宋哲元，所有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会洽商。这就实际上拒绝了田代的要求。至此，日本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华北的计划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1936 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国民党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也高涨起来。1936 年 12

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开创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中国政局的这一巨大变化，对日本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日本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像“九一八”事变时那样不战而夺取中国领土了。随着日本制造“华北国”阴谋的破产，其法西斯嘴脸便暴露无遗，即下定决心按照既定国策，用武力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

三、芦沟桥畔的枪声

随着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的建立和侵华活动的日益加剧，充分表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势在必行，而以 1936 年西安事变为起点，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也表明中国全面抗战更是势在必行。到 1937 年，日本侵略与中国反侵略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可以说“七七事变”就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

1936 年下半年，日本陆海军就极力鼓吹对华开战。1936 年 9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对华时局对策》中就提出：“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果断地立即给予惩罚。”并为此“将给中国驻屯军增加从国内派往锦州待机的一个师团和关东军的部分兵力。日军的进攻，要求行动神速机敏，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中国以闪电般的打击，就地解决问题。”这就实际上授权中国驻屯军，随时可以对中国使用武力。因此，日军在取得华北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后，即开始对我步步紧逼，利用增兵的机会，在华北抢占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战略要点。因此，占领丰台便成为日军吞并华北的当务之急。

1936 年 5 月中旬，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任何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为下一步驻军做准备。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中国第 29 军第 37 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要求日军归还，遭到日军毒打。次日，日军派出一朝鲜人到中国军队兵营交涉，硬说兵营马厩是日方的，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兵营，在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坚决拒绝后，该名朝鲜人立即拔出短刀，并召来数名日军同中国士兵械斗。日本中国驻屯军即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无理要求第 29 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这就是日军为占领丰台所制造的第一次丰台事件。这次事件以中方的让步而解决，但日军企图将中国军队从丰台赶出的目的没有得逞。

第一次丰台事件后，在丰台驻防的是中国第 29 军第 37 师第 222 团 1 营（营长张华亭）。该营驻丰台车站，并以车站为中心部署防卫，构筑工事。1936 年夏，随着日军的增兵，丰台情况日趋紧张。7 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强行进驻丰台。此后，日军即不时对我驻丰台车站的张华亭营进行挑衅。日军士兵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到丰台车站“闲逛”，遇我士兵较少时，他们就向我士兵摩肩撞臂，拳打脚踢，当我士兵气急还手时，便造成斗殴事件。8 月 31 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擅自闯入驻丰台的 1 营兵营，与中国士兵发生殴斗，森川受伤。日军即以此为借口，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9 月 18 日下午 6 时，丰台中国驻军第 6 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遂用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中国军队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不久，日军第 1 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第 1 大队从北平赶来增援丰台日军，并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中国驻军停火，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 日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 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就是日军为占领丰台所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它使日军达到了完全占领丰台的目的。

日军强占丰台，不仅给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 29 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也为它的下一步侵华战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战略据点，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1937 年 6 月 5 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视察华北后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加兵力很有必要。6 月 9 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陆军本部的电报中提议：“ 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兰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由此可见，日本已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上了日程。

“ 七七事变 ”前，北平已是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东有日本卵翼下的“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和日本天津驻屯军打前站，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中国第 29 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取北平，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我军据此，则门户紧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芦沟桥为日军所占领，则北平就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芦沟桥这一战略要点，就成了中日双方争夺华北的必争之地。因此，自日军夺占丰台之后，就一直对宛平城虎视眈眈，觊觎着芦沟桥，总想夺取这一战略要地。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芦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夺取平津地区，然后以此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略战争。

1937 年春，平津形势吃紧，特别是芦沟桥附近中日两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的紧张形势正如一句唐诗所云“ 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仍然在抗战与妥协之间徘徊不定，特别是在丰台失守后，仍然是“ 亡羊 ”而无意“ 补牢 ”，华北防务一切都未置可否。而身负平津要职的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竟然于 1937 年 5 月 11 日返回故乡山东乐陵扫墓。

从 1937 年 5 月开始，驻华日军即频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从白天发展到黑夜，从虚弹发展到实弹。特别是驻丰台的日军，更是经常在宛平北郊举行以宛平县城为目标的演习，日军联队长、旅团长，直至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都陆续到丰台指挥日军演习。6 月，在东京盛传“ 七夕的晚上，华北将发生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7 月 6 日，即“ 七七事变 ”爆发的前一天，驻丰台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到宛平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纠缠达 10 余小时之久，至天黑才退走。这一切迹象都充分预示着日军侵华战争的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日军加紧在华北集结，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现在是万事俱备，只要再制造一个新的“ 事件 ”就行了。“ 事件 ”终于在古老的芦沟桥畔发生了。

1937 年 7 月 7 日，这既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又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夜晚，晴空万里，由于没有月亮，静静的黑夜，能见度极

差。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就发生在这个漆黑的夜晚。下午 7 时 30 分，驻丰台的日军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携带实弹，全副武装，以芦沟桥为假想敌，在芦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大瓦窑之间进行夜间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天黑以后，日军即开始演习。

这时，芦沟桥的中国驻军是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09 旅（旅长何基沣）吉星文团的一个营。夜晚 11 时左右，卫兵忽听到城东的日军演习方向有数声枪响。鉴于此类事件时有发生，当时中国驻军并未引起特别注意。可是在午夜时分，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即电话通知国民党冀察当局，称：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芦沟桥附近演习期间，忽闻宛平城内发枪数响，致使演习部队一时呈现混乱，结果一名士兵失踪。并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国驻军的断然拒绝。可是，由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和牟田联队长已经确定了“占领宛平县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的方针。片刻，冀察绥署的日本顾问缨井又来电话，声称上述条件如国民党方面不允，他们将以军队包围宛平城。这时，中方得到报告说：丰台日军一个大队，携带 6 门大炮，正在向芦沟桥方向前进。因此，第 29 军在部署军事防御的同时，副军长秦德纯委派当时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到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涉。据王冷斋回忆说：8 日凌晨 2 时左右，王冷斋等人在北平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中国第 29 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会谈。此时，松井已接到关于日力失踪士兵归队的报告，但仍无理要求先查清士兵失踪的原因后，再进行谈判。此时，国民党冀察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便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现地调查。

国民党当局所派代表为河北省第 4 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三人；日方所派代表为樱井、日军特务机关副官寺平、秘书斋腾三人。与此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司令部还于 7 月 8 日凌晨，命令驻丰台的第 3 大队于芦沟桥火车站西南方向附近随时准备战斗，并派出 1 个步兵中队和 1 个机枪小队随谈判代表进入宛平城内。王冷斋等人在前往宛平的路上，看到日军 300 余人，分乘 8 辆汽车正在向芦沟桥出发。当王冷斋一行到达宛平东北郊的沙岗时，见日军已摆好了进攻阵势。4 时许，双方代表进入宛平县署。在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前，日方代表寺平便气势汹汹地对王冷斋说道：现在事态十分严重，已来不及调查、谈判，中国驻城内守军必须马上退至宛平城西，待日军进入宛平城东门内时再开始谈判。这种在机枪、大炮威胁下，用刺刀逼向对方代表的谈判，实为世界外交史上所罕见。然而，日本侵略军的淫威并没有吓倒中国第 29 军的将士们，中国代表坚决拒绝了日方的蛮横无理要求。 4 时 30 分，日军即向宛平发起了第一次攻击，负责宛平守卫的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长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毅然奋起自卫。双方互射 1 小时左右，5 时许，樱井持白旗站在宛平城墙上与日军联络，日军才停止射击。双方代表开始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日方代表强令国民党军必须于当日下午 8 时前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否则日方将终止谈判进行武力解决。这种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所谓谈判，理所当然地为中方代表所再次拒绝。 5 时 30 分，日军再次发起攻击，曾一度夺去 29 军所守卫的龙王庙、五里店、芦沟桥火车站等处阵地，于 6 时左右开始以大炮猛烈轰击宛平县城。谈判即告结束，双方撤回各自的谈判代表。

7 月 8 日上午 7 时 30 分，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向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下达如下作战命令：（一）我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的芦沟桥附近地区，谋求事件的解决；（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芦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于是，日军即开始向丰台地区集结兵力，日本中国驻屯军特意将其步兵旅团的精锐机械化部队——驻通州的第 1 联队第 2 大队向芦沟桥紧急增援。8 日下午 3 时 30 分，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河边正三旅团长到丰台坐镇指挥，并命令第 3 大队在龙王庙附近渡过永定河，占领西岸，待第 1 大队到达后进攻宛平城。下午 5 时，日方向宛平城发出最后通牒：（一）限于当日下午 8 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至永定河东岸，如果逾期，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城内的日本顾问樱井等出城。日方的这一最后通牒，很显然是以武力相威胁，妄想胁迫中国军队放弃宛平，以便不战而得宛平城。中方爱国将士自然不能接受这蛮横要求，于是日军便于下午 6 时零 5 分，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宛平城，炸毁了专员公署，炸伤了守军金振中营长。第 29 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一方面驻守宛平的守军坚守阵地；另一方面由何基沣旅长亲率主力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向日军反攻，双方激战至深夜，何基沣旅逐渐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芦沟桥附近铁路及龙王庙地区，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并将侵占芦沟桥火车站的数十名日军歼灭殆尽。

日军 7 月 8 日的进攻，在中国军队的强力反击下均告失败，其夺占芦沟桥的阴谋宣告破产。当日晚，日方松井和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进行交涉。同时，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和第 29 军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进行会谈。直到 9 日凌晨 3 时，松井和秦德纯达成了如下对日方极为有利的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东岸，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芦沟桥的守备由中国保安队担任，人数约 200—300 人，定于当日上午 9 时换防。然而，就在中日双方举行谈判的时候，7 月 8 日晚 9 时 20 分，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下达命令：“ 旅团将兵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攻击。 ”因此，尽管协议签订后，中国军队即开始按协议执行撤军，但日军并不按协议撤兵，却以监督中国军队是否履行协定为借口，仍将第 1 联队主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一部分兵力继续占据沙岗。并辨称它们有权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9 日清晨 6 时，当中国军队正在撤兵时，河边却违约，下令炮轰宛平城，先后发射炮弹 100 余发。当中国方面责问日方违约时，日军却以“ 掩护部队撤退 ”为由进行搪塞。

9 日上午 7 时 50 分，按照双方协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国保安队，在芦沟桥附近的大井村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不能前进。相持至 12 时 20 分，在中日双方派出的负责监视撤兵的委员到达后，日方才同意中国保安队前往宛平，但只同意派 50 人且只能携带步枪和 30 发子弹进入宛平城接防。这时，日军不仅没有撤去一兵一卒，反而继续增加兵力。9 日下午 3 时 40 分，河边命令刚从通州到达丰台的第 2 大队，迅速到宛平东北郊的沙岗接防，企图乘中国军队与保安队换防之机，占领宛平。后在中方的反复交涉下，日方才同意中国保安队全部进入宛平城。但由于日方不许保安队携带轻机枪等武器，所以，一部分保安队员只好携带机枪返回北平，这样，实际到达宛平的保安队不足 200 人。尽管如此，中方还是同意将宛平驻军全部撤出，退守永定河西岸。

这时，日军第 2 大队仍在沙岗驻守，并企图乘宛平守军保安队既弱又少

的有利时机，夺占宛平。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日军驻沙岗的第 2 大队突然开枪进攻宛平城。待王冷斋要日方仍留在宛平城监视撤军的中岛与其司令部联系时，日军竟然诡称“ 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军绝无攻城企图。 ”在攻城无效的情况下才停止了射击。10 日上午 7 时 30 分，王冷斋等人向樱井等提出，就驻沙岗日军的撤离进行谈判时，樱井等人却狡辩说，因为还有两具士兵的尸体尚未找到，所以日军要继续在沙岗附近进行搜索。对此，王冷斋等人提出，由中日双方派人一起在芦沟桥附近寻找，樱井表示同意并定于下午 1 时出发。后来，樱井等人却借故离席，不辞而别。因为，“ 七七事变 ”后日本国内正在酝酿全面出兵侵略中国的计划，而且关东军已将其混成第 11 旅团调至长城一线，天津日军也正纷纷出动。这一切都预示着：“ 七七事变 ”这一局部冲突，正在向全面战争演变。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日方在谈判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使自己在下一步全面入侵中准备得更加充分而已。正如冯玉祥将军在事变发生两周后对记者所说的：“ 芦沟桥事变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 九 · 一八 ’故伎重演于华北了。 ”

四、“ 不扩大 ” 的幌子

“ 七七事变 ” 的爆发，为日本军政当局实现其长期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提供了一个理想借口，因此日本法西斯分子欣喜若狂。“ 事变 ” 后的次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 “ 北方（指苏联）暂没有什么威胁，应乘此大好时机对冀察加以一击。 ” 会议决定立即动员 2 个旅团随时准备开赴华北作战，并把第 11 旅团调往长城一线待命。同时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 因暴戾的第 29 军挑衅，而在华北引起事端。对此，关东军保持极大关心和决心，严密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 此外，关东军还专门派参谋田中隆吉到华北，鼓动日本中国驻屯军将 “ 事件彻底地扩大下去 ”。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在得知 “ 七七事变 ” 的消息后，也立即向参谋本部主动请战说：第 20 师团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应“ 利用这一事件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 ”。

8 日晨，“ 七七事变 ” 的消息一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决策层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随之出现了 “ 扩大派 ” 和 “ 不扩大派 ” 两种意见。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 “ 扩大派 ” 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只需要以三四个师团的兵力给中国一击，就会使中国屈服。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甚至扬言说：只要日本出现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另一名成员也趾高气扬地断言，充其量也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提出 :“ 事已至此，决心干吧 !应当制订进攻南京的计划。” 杉山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竟然狂妄地宣称：“ 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 ” 而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 “ 不扩大派 ”，则比较重视中国的顽强抵抗力量，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会遇到中国的顽强抵抗。而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他们主张应尽快动员足够的兵力，然后再出兵中国。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 “ 扩大派 ” 与 “ 不扩大派 ” 之间，只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选择上存在分歧，而在是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尽管日本在 “ 七七事变 ” 前不断向华北增兵，但要想发动一场对华全面战争，日本的兵力还差得比较多。因此，经日本军政当局的慎重考虑，当天上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 不扩大 ” 方针，提出：（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日方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日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五）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不难看出，这一所谓的 “ 不扩大 ” 方针，实际上恰是扩大事态的方针：第一，在日本侵略军看来，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上驻兵，进行军事演习，占领中国土地，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主权，这一切在它们看来都是“ 合法的 ”，是《辛丑条约》、《塘沽协定》等所赋于的 “ 权利 ”。而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侵略却是 “ 不法行为 ”。因此，按照这个强盗逻辑，在事变后，日方便将事变发生的责任完全推诿于中国方面。可以说，如此颠倒黑白地来解决事件，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第二，提出要中国军队撤退、道歉等，完全是无视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是有意给中方为难；第三、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方的要求，日军将采取 “ 适当措施 ”，这就为日军随时采取新的

军事行动扩大事态，开了绿灯。就在这个“不扩大”方针出来的第 2 天，日本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倘事件因华方拒绝反省，而愈益扩大，日方决取断然行动。”这就充分说明了名为“不扩大”实为“扩大”的本质。

本来，当时在北平，中日双方已于 9 日凌晨达成了对日方来说比较有利的停战协议，但由于日本内阁所提出的这一“不扩大”方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第二天又单方面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重新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一）第 29 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对直接责任者给以处分，并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二）中国军队和丰台日军驻屯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冲突事件，因此芦沟桥及宛平城周围、龙王庙地区，改由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三）芦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的防地，却要中国军队撤出；明明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却无理要求取缔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可以说，这完全是有意提出中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扩大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和为其调兵遣将争取时间。在日方的威逼下，中方代表除第三条外，全部接受了日方的要求。

此后，在“不扩大”的幌子掩护下，为了迅速增兵华北，以发动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日本军政当局一方面高喊“不扩大”，希望和平解决；一方面却在暗中磨刀霍霍，疯狂地拨动着战争机器的的发条。1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 14 时，日本内阁举行五相会议，陆相杉山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 个师团、目前暂用 3 个师团和 18 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但为了舆论而言，今后仍应坚持不扩大方针。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杉山提出的派兵案，并首次把芦沟桥事件称为“华北事变”。15 时 20 分，又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完全同意了五相会议的议案。16 时，首相近卫晋见天皇，上奏向华北派兵，16 时 20 分，日军参谋长及陆相，进宫参驾，请求尽快派兵；17 时 05 分，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来上奏海军对华用兵事宜，天皇均予照准。18 时 24 分，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北增兵的政府声明》，在声明中称：中国第 29 军“于 7 月 7 日夜在芦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余地。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要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8 时 35 分，参谋总长即发出临参命第 56 号，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其管辖的独立混成第 1、第 11 旅团及空军一部（包括战斗机、侦察机和轰炸机各 2 个中队），火速派至华北并接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20 时，又以临参命第 57 号下达给第 20 师团，令其迅速开往华北。而所有这些疯狂的战争准备，都是在其所谓的“不扩大”幌子下进行的。

为了掩盖企图，迷惑中国人民，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宣称：“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这里，向中国派兵是为了“局势不再扩大”，是为了“不抛弃和平谈判”，这真是千古欺人之怪谈。对此，石原莞尔在 1939 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根据一般的考虑，如果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